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⑮

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 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

尤淑君 著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 I S T O R Y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15

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
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

尤淑君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

尤淑君 著

--初版--臺北市：政大歷史系，民國95年

面： 公分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15）

參考書目：面

ISBN-13 978-986-00-6610-4 （平裝）

ISBN-10 986-00-6610-8 （平裝）

1. 明清史 — 專題研究 — 政治文化

□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15 □

書 名 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

著 者 尤淑君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發 行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地 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

定 價 新臺幣伍佰元整

承 印 者 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七樓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13 978-986-00-6610-4

ISBN-10 986-00-6610-8

主編序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創立於民國五十六年七月，旨在培養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人才。民國六十五年八月，成立歷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以培養歷史專業研究人才為宗旨，以中國近現代史、近代中外關係史為研究重心。民國七十六年八月設立博士班，研究領域擴及中國政制史、台灣史等。民國八十一年八月，系所合併，改稱歷史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系所事務皆由系主任擔任。

本系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提升學術地位，尤以提升師生之學術研究水準為努力重點。具體的作法，就是鼓勵並提供出版機會，讓師生研究成果有與學術界交流之管道。主要的出版品，有教師發表研究論文之《政大歷史學報》，研究生發表研究作品之《史粹》，以及作為大學部學生討論園地之《史薈》，均定期出刊。然而，以上刊物因篇幅所限，無法容納專書形式之著作。為補足此缺憾，本系於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出版「政治大學史學叢書」，刊行教師之專書與優秀博、碩士論文，以呈現本系、所之重要研究成果。本書即為此叢書之一，由尤淑君就其碩士論文改寫而成。

本書以明代嘉靖朝的大禮議事件為切入點，從四個面向展開討論，考察嘉靖朝的政治文化體系。首先，從禮議兩方的爭論，探討嘉靖皇帝如何藉由「人情論」，逐漸異化皇權的公共性質，藉以掙脫禮法的束縛，擴展皇帝的個人性。其次，從《明倫大典》的編撰過程，釐清嘉靖君臣如何藉由對儒家經典的再詮釋，重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取得大禮議的正當性，連帶影響後世史家對大禮議的評價。再次，從嘉靖朝的禮制改革過程，探討嘉靖君臣如何逐步改易國家禮制，修改名分原則，動搖禮法秩序，讓獻皇帝得稱宗祔廟，並建立新宗統重塑皇權。最後，從嘉靖朝的政治文化生態，觀察皇帝、內閣首輔及官僚體系的政治作為及互動關係，指出大禮議破壞名分禮秩，讓三方各自脫離以「禮」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體系，開啓了明朝政治紛亂與社會失序的危機。

整體而言，作者除在史料考訂、史實分析各技術層面，達到史學研究的專業要求外，更能從新的角度探討舊題目，獲致許多新的見解，將這個領域的研究前沿，向前推進一大步，謹此向愛好歷史的讀者們推薦。

唐 啟 華 誌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意義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第三節 欲提出的問題	16
第四節 研究路徑	18
第一章 「大禮議」肇因、經過及結果	29
第一節 外藩入繼	30
第二節 繼嗣繼統之爭	42
第三節 左順門事件	73
第四節 小結	89
第二章 從《獻皇帝實錄》到《明倫大典》	95
第一節 《獻皇帝實錄》到《明倫大典》的編纂過程	98
第二節 《明倫大典》內容釋義	116
(一) 兄終弟及	122

(二) 繼統是否需繼嗣	127
(三) 親親尊尊，二者孰重	135
(四) 可否爲獻皇帝立世室的禮儀爭議	142
第三節 《明倫大典》修纂意義	149
第四節 小結	168
 第三章 禮制更定的政治文化意義	 173
第一節 顯陵改制，建立世廟	175
第二節 分祀天地，改定郊禮	183
第三節 廟制變異，分建九廟	204
第四節 明堂復古，獻皇稱宗	223
第五節 廟制底定，睿宗祔廟	236
第六節 禮制與政治的關係	255
(一) 郊祀改制	258
(二) 廟制改革	265
(三) 禮爲政之本	272
第七節 小結	275
 第四章 從大禮議看嘉靖朝政治文化	 279
第一節 明前期的政治生態	281
第二節 從「天理」「人情」論「公」「私」	298
第三節 首輔難爲：從楊廷和到嚴嵩	315
(一) 楊廷和	321

(二) 張璁	328
(三) 夏言	347
(四) 嚴嵩	357
(五) 首輔的身分	363
第四節 從道不從君：言官的道德危機	367
第五節 小結	383
 結論	 387
附錄一：明代世系表	395
附錄二：大禮議編年表	399
徵引書目	459

圖表目次

圖1-1	左順門位置示意圖	86
圖3-1	明孝陵前殿規制	177
圖3-2	明孝陵後寢規制	178
圖3-3	顯陵結構及風水示意圖	178
圖3-4	改制後的社稷壇總圖	190
圖3-5	洪武十年定天地合祀後的郊壇總圖	196
圖3-6	天地分祀的圓丘總圖	200
圖3-7	天地分祀的方澤總圖	200
圖3-8	明萬曆朝時的北京城圖	203
圖3-9	洪武年間的四親廟制	204
圖3-10	周代都宮七廟制	205
圖3-11	洪武年間太廟九室圖	207
圖3-12	嘉靖改制前的太廟正殿圖	208
圖3-13	嘉靖改制前的太廟後寢圖	208
圖3-14	弘治前間的四時袷祭圖	212
圖3-15	嘉靖年間新定的禘祭圖	212
圖3-16	嘉靖十三年太廟的分建九廟廟次圖	219
圖3-17	嘉靖二十四年太廟的同堂九室廟次圖	255
附錄一	明代諸帝世系圖	398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意義

明代嘉靖朝(1522-1566)的大禮議(1521-1545)，¹即興獻王朱祐杭(1476-1519)²尊號之爭，又稱「大禮」之議。大禮議的背景，緣於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駕崩後，既無子嗣，又無同胞兄弟繼承皇位，事先也未安排過繼的嗣位人選，代表君統宗統合一的大宗帝系自此斷絕。昭聖皇太后張氏(?-1541)與內閣首輔楊廷和(1459-1529)等人的商議下，決定由興獻王世子朱厚熜(1507-1566)以孝宗皇子的身分入繼大統，即皇帝位，是為嘉靖皇帝(1521-1566)。³朱厚熜即位後，堅稱自己以藩王身分繼承帝位，拒絕承認是孝宗弘治皇帝(1470-1505)

¹ 大禮議的時限是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武宗皇帝駕崩，至嘉靖二十四年六月興獻王以睿宗身分入祔太廟為止。「大禮議」時限是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七月左順門事件為止，即大禮議事件的第一階段。

² 興獻王朱祐杭是憲宗成化皇帝第四子。成化皇帝寵愛朱祐杭，但基於明帝國採取「立嫡立長」的皇位繼承制，故由第三子朱祐樞繼承皇位，是為後來的孝宗弘治皇帝。

³ 正德皇帝死後，興獻王一脈與大宗帝系倫序關係最近，但興獻王早在正德十四年薨逝，內閣首輔楊廷和只好向下推衍人選，故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為正德皇帝的皇位繼承人。

的嗣子身分，也不願接受楊廷和等人的勸說，一再提高對親生父親朱祐杙的崇敬儀式。張璁(1475-1539)等人倡議「人情論」後，朱厚燾大受鼓舞，竟不顧禮部諸臣的反對，直接下詔稱興獻王為「皇考」，引起「左順門事件」(1524)。

「左順門事件」後的二十年間，嘉靖皇帝為防止士人暗地批評「大禮」，因而編纂《明倫大典》，藉「人情論」的理論體系，建構自身世系的正當性，鞏固眾臣對其皇帝身分的認同，使皇權得跨足至文化領域，箝制士人的話語權力。而且，嘉靖皇帝「以制作禮樂自任」，⁴藉尊崇《周禮》、恢復「祖制」為由，大幅改易國家禮制，強調自己受「天命」得位，重塑皇權，並趁機改變宗法慣例，⁵模糊宗統(孝宗一脈)與家系(獻皇帝)的界線，逐步變易宗統，孝宗、武宗二帝淪為贅疣，使嘉靖皇帝一脈從小宗家系變為大宗帝系。

當嘉靖君臣討論「大禮」時，議禮雙方皆牽引出「天理」是否重於「人情」及「尊尊」是否重於「親親」的討論串，其焦點在於嘉靖皇帝身分(identity)的判定。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裡，政治權力與名分禮秩的關係，本是一體兩面，一旦錯置名分，禮秩將日

⁴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武英殿本)，冊17，卷196，〈張璁〉，頁5178。

⁵ 趙克生，〈明朝嘉靖時期國家祭禮改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3)，頁5-6。

趨瓦解，使皇帝脫離禮法的規範，皇權漸失其「公義」性質。同時，名分禮秩的瓦解，也破壞了原本的權力分配原則，不再有一合理的標準。為求晉位，官僚不得不依附有力人士，造成朋黨林立的現象，黨爭日趨激烈。當各黨爆發衝突、相決不下時，只好尋求皇帝的支持，逐漸喪失「為王者師」的政治理想，士人也不再追求「公義」的實現，因而讓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日益惡化。

本文擬以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從名分禮秩的角度，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⁶、頒佈《明倫大典》⁷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探討政治權力、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政治文化的變化。討論的主題如下。

一是探討嘉靖君臣如何藉經典的再詮釋，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統合官方說法，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以平息朝野內外的不滿輿論。又如何發起禮制改革，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嘉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的。並由隆慶皇帝(1566-1572)至崇禎皇帝(1627-1644)的態度，觀察他們如何看待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反證大禮議對明帝國政治文化體系的影響。

⁶ [明]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7冊(臺南縣：莊嚴文化，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張汝紀等刻增修本影印)，奏疏卷3，〈再議〉，頁19b。

⁷ [明]楊一清(奉敕撰)，《明倫大典》(據明嘉靖七年內府刊本微捲影印)。

二是探討大禮議如何影響朝堂內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尤其當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如何影響君臣關係，進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權力範圍及政治生態的既有限制，以瞭解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

三是探討大禮議引發名分禮秩的危機及其影響。名分禮秩的錯亂，嘉靖朝的政治生態將產生何種變化。再由嘉靖君臣對「名分」的爭辯，討論皇權的性質，究竟是作為帝國政權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此外，士人們將如何藉由儒家經典再詮釋的方式，試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安排，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箝制皇帝的個人性，重新將政治權力和社會秩序導回「公義」的軌跡。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明清兩代的學者對大禮議評價不一，聚訟紛擾，各抒己見。從評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明代學者似乎比清代學者委婉許多。一方面，自然是害怕觸犯君上忌諱，更重要的是，明代史家引用的史料大多採自官方有意詮釋的《明倫大典》，以致對大禮議的歷史評價偏向官方論點。自毛奇齡(1623-1716)《辨定嘉靖大禮議》一出，清代史家開始從禮學角度批評「大禮」實為非禮。尤其是《明史》多採用毛奇齡的論點，直視「大禮」實為嘉靖皇帝最大的

政治過失，以致嘉靖一朝「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⁸

民國以降的史學界對大禮議的看法，則大多承襲《明史》的論點，尤以明清史專家孟森(1868-1938)最為著名。孟森先生指出，大禮議是皇權與閣權衝突的政治事件，因而大禮議被歸為政治史的研究範疇。近年來，不少專家學者受到歐美史學的影響，不再熱中於明初的制度史或明末的黨爭研究，轉而把研究重心放在明中葉的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及江南士紳等議題。⁹可惜，嘉靖朝史似無法得到學界的青睞，除了論及嘉靖朝政局的專著不多，仍待開發，多數著作則視嘉靖朝為萬曆朝(1572-1620)的背景討論，¹⁰或關心陽明學的發展；¹¹或著眼於江南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情況。

⁸ 《明史》，冊2，卷18，〈世宗二〉，頁250。

⁹ 近年關於明史研究之著作與著述，詳見李小林(等著)，《明史研究備覽》(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張璉，〈近三十年海外明史研究學術期刊概介〉，《明代研究通訊》，1(臺北，1998.07)，頁15-28；吳智和，〈二十世紀臺灣明史研究回顧介述〉，《明史研究專刊》，14(宜蘭縣，2003.08)，頁285-354。

¹⁰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9)，頁3；懷效鋒，《明清法制初探》(北京：法律，1998)；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民，1997)；小島毅，《中國近代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6)；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上海：上海古籍，2000)。

¹¹ 懷效鋒，《嘉靖專制政治與法制》(長沙：湖南教育，1989)；中山八郎，《明清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95)；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2000)；小島毅，《中國近代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6)；楠本正繼，《宋明時代儒學思想の研究》(東京：

大禮議是貫穿全文的主要脈絡。為求研究脈絡的完整性，擬對大禮議事件，政治權力與經典詮釋的關係，及嘉靖朝國家禮制變革等三個面向，分別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

(一) 大禮議事件

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首先注意大禮議之於嘉靖朝政局的重要性，「嘉靖一朝，始終以祀事為害政之樞紐，崇奉所生，以及憎愛之私，啓人報復奔竟之漸矣」。¹²然而，若以嘉靖皇帝欲崇敬本生父母的「私心自用」，似難全然解釋嘉靖君臣發起大禮議的動力。因而後有美國學者Carney Thomas Fisher，臺灣學者張治安及朱鴻教授，各自分析大禮議背後的文化背景，嘉靖朝堂的權力衝突，及嘉靖皇帝的心理特質，以瞭解嘉靖朝政局之變化。

張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議禮與黨爭〉一文，指出大禮議是嘉靖朝黨爭之先端，卻因「左順門事件」的刺激，讓士人的政治表現趨於激烈，視「拂帝意」為氣節之表現，以致後來不斷出現違抗君命、好發議論、派系傾軋等現象，因而讓明帝國陷入內耗

池學園，1985)；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上海人民，1997)；荒木見悟，《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1992)；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張璉，〈從大禮議看明代中葉儒學思潮的轉向〉，《明清史集刊》，3(香港大學，1997.06)，頁51-68。

¹² 孟森，《明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2002)，頁224。

的窘境。¹³

Carney Thomas Fisher 的博士論文《明代的大禮議》(*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是歐美學界對大禮議研究的首要之作。¹⁴ Fisher先針對漢代帝系爭議的三件案例(西漢宣帝、哀帝與東漢光武帝)與宋代濮議案，分別討論禮學理論的差異，再分析明代大禮議「七爭」及其禮學根據，最後探討王陽明的心學、道德與情慾的衝突及大禮議事件的關係，指出明中葉學術思想變化、社會現實與政治事件三方面，實有緊密的互動作用。

朱鴻〈「大禮」議與明嘉靖初期的政治〉，雖為碩士論文，卻是臺灣學界對大禮議研究的重要成果。¹⁵該文以心理史學作為研究方法，著重探討嘉靖皇帝孝親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再利用量化統計，分析濮議派與考獻派兩派人士的地緣、血緣及黨派特性。¹⁶最後指出大禮議壓制了代表道統的楊廷和等人，代表治統的嘉靖皇帝因而能擴張皇權，使君主專制的勢力達到頂峰，文官集團的

¹³ 張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議禮與黨爭〉(臺北：國科會補助論文，1972，油印本)。

¹⁴ Carney Thomas Fisher, *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7).

¹⁵ 朱鴻，〈「大禮」議與明嘉靖初期的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78)，頁2。

¹⁶ 朱鴻指出濮議派人士之間多有地緣、科舉同年及師生的關係。考獻派結合的因素有三：考獻派人士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久蓄奪權心理及其對「大禮」有共同主張。

道統意識卻降到最低點，開黨爭之風氣，使明中葉以降的政局日趨混亂。

上述四文的資料來源，多取自《明實錄》、《國榷》及《明史紀事本末》。討論時限於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的「大禮議」，焦點集中在事發過程、爭議結果及其權力變化，不僅建構大禮議的歷史背景，也釐清議禮雙方的人事糾葛，證明了大禮議對嘉靖朝政局的影響，實不容小覷。尤其是朱鴻教授以量化分析議禮雙方背景，讓後繼者處理嘉靖初年的人事變遷時，有極為便利的參考價值。

然而，前人的論點也非沒有再思考的空間。例如，近年新起的中國大陸學者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一書，便大量採用議禮諸臣張璁、桂萼等人的文集，給予張璁等人正面的評價，否定楊廷和等人的定策之功，試圖推翻過去學界的定論，重新檢討大禮議的功過是非。並且更進一步地發揮其業師蔡美彪先生的看法，指出張璁等人的政治革新，即代表新興勢力取代守舊勢力的歷史性轉變，遂奠定了張居正(1525-1582)發起萬曆變法的基礎。¹⁷田澍立論大膽，觀點新穎，雖招致不少學者的批評，但恰與中國大陸近年力倡改革的風氣相呼應，又發表踴躍，著作頗豐，故成一家之言。

相較於專書，有關於大禮議的專文研究，則十分豐碩。茲列

¹⁷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6。